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机制研究^{*}

吴 越 卢云峰

摘 要：公共文化复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文化复兴中的结构性要素，而较少关注文化复兴背后的机制。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案例研究发现，乡村公共文化的复兴至少包含了两种机制：一是互动仪式的集体欢腾，它以相互关注的情感共鸣生成群体团结的情感能量与成员符号，尽管这种团结是短期的、局部的；二是仪式团结市场，它以互动仪式为基础，使不同的仪式在链式循环反馈中产生长期的、整体的团结，这其中又可分为互动市场的优胜劣汰、情感能量的集体理性、成员符号的匹配这三重作用。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关键，就在于一方面通过互动仪式链的多元性强化村庄整体的公共活力，另一方面通过互动仪式链的互通性恢复村庄整体的公共意识，最终建立起村庄整体的长期社会团结。

关键词：乡村公共文化；互动仪式链；集体欢腾；仪式团结市场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 (2025) 09-0154-12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25.09.011

作者简介：吴 越，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讲师；卢云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而乡村公共文化复兴可谓文化振兴的关键。乡村公共文化具体展现为乡村社会中一系列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文化活动，如地方民俗活动、集体仪式、文体活动等等，它有助于维系乡村公共秩序、提升乡村公共活力、促进乡村公共团结，是乡村社会凝聚力、秩序力和发展动力的源泉。随着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许多乡村地区的传统公共文化都经历过衰落。例如，庙宇、祠堂等传统公共文化空间逐渐停止使用，^①庙会、祭祖、社戏等传统公共文化活动也逐渐减少；^②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逐渐让位给私人性的文化娱乐体验，“独自看电视”“独自玩手机”等现象日益普遍，导致农民社会关系松散化与乡村共同体原子化，甚至有的地方大量农民因节假日缺乏文化生活而沉溺于打牌赌博。^③近些年来，国家与地方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复兴乡村公共文化，这在一些农村地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部分地区对传统节日、非遗传承等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深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文化治理的传承与转化研究”（项目编号：23CSH013）的阶段性成果。

① 陈波：《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运行：结构变迁与场景构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 年第 1 期。

② 王智洋：《中国语境下乡村公共文化领域的变迁与重构》，《民族艺术研究》2020 年第 2 期。

③ 吴理财、解胜利：《当代中国大众娱乐习惯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以文明新风破除农村赌博陋习》，人民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rb/pc/content/202412/12/content_30034368.html，2024-12-29。

度挖掘,将节庆活动从私人领域带回公共领域,以庙会复兴、非遗展演等方式重新唤起地方社会的共同文化记忆;再如,部分地区将现代流行元素融入到传统文化中,创造性地激发传统文化的现代活力,掀起了汉服改良、民乐跨界、手工艺数字化等国潮流行文化,打造出“潮汕英歌舞”“大唐不夜城”等新时代文化名片,以及“村超”“村BA”等新的民俗文化活动。但在更多的农村地区,公共文化的复兴实践仍然面临空间空置化、活动形式化、服务低质化等困境。^①可见,乡村公共文化的复兴是必要的,但复兴实践并不总是能带来预期的复兴成效,因而厘清复兴背后的机制问题,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互动仪式链视角揭示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机制,探讨村民究竟如何在一系列公共文化活动的具体情境中恢复和强化了乡村整体的社会团结。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当前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乡村公共文化的复兴问题,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种进路:一是探讨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影响因素,二是阐述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实践路径。其一,影响因素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了乡村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对公共文化兴衰的影响,具体包括农业文化向工商文化、熟人文化向陌生人文化、稳定的共同体文化向流动的异质性文化、家庭主义文化向个体主义文化的转变,以及互联网和大众传媒文化的普及等等。^②这些文化变迁因素消解了乡土传统的礼俗文化生态,致使传统公共文化失去土壤、现代私性文化不断蔓延,因而乡村公共文化的复兴需要充分考量这些变迁的影响。^③其二,实践路径研究从微观层面探讨了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可行方式,包括传统公共文化的传承转化和现代公共文化的探索建设。前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民间信仰重塑为乡村公共性建构的情感符号;^④二是将宗族活动由族际扩展到村落并赋予村民新的公共认同载体;^⑤三是将传统节日重新纳入公共时间并使其成为乡村文化生活节律的基础。^⑥后者也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扩展乡村的公共文化空间,既包括将传统的祠堂重构为现代的文化礼堂,^⑦也包括建设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等新型文化空间;^⑧二是培育乡村的公共文化组织,成立读书会、文艺队、秧歌队等村民文化自治组织,提升村民建设公共文化的主体性;^⑨三是丰富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以绵密而多样化的文化活动激发乡村的公共活力。^⑩

尽管学界对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宏微观条件和结构性要素已经有了较多探讨,但对这些条件和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还缺乏细致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引入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来研究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机制,该理论将人们在微观情境中的互动都视为一种仪式,揭示互动仪式达至群体团结的作用机制,以及互动仪式如何在时空中经由情境际遇的动态延伸而形成了互动链的结构,进而将微观情境与宏观结构统一起来。^⑪以互动仪式链视角来看,乡村公共文化通过一系列仪式性互动情境,塑造村民的集体意识,赋予其群体成员身份符号,增强其群体团结感,

① 耿达:《公共文化空间视角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思想战线》2019年第5期。

② 陈勇军、郭彩琴:《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逻辑、路径及其限度》,《学术探索》2023年第2期;黄振华、常飞:《从乡土中国到乡愁中国: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理论月刊》2022年第10期;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③ 王璐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张晓琴:《乡村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及现代治理转型》,《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④ 张祝平:《论民间信仰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理和机制创新》,《学术界》2022年第3期。

⑤ 宣朝庆、葛珊:《村庄公共性再生产与祭祖活动公共化的蜕变——浙江省G村祠堂仪式考察》,《民俗研究》2021年第3期。

⑥ Philip Clart,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in Randall L. Nadeau (ed.),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Chinese Religions*,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2, pp.219-236.

⑦ Ningning Chen, "Governing Rural Culture: Agency, Spac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Ancestral Templ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47, 2016, pp.141-152; 鲁可荣、程川:《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以浙江三村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⑧ 杜鹃:《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求实》2021年第2期。

⑨ 吕宾:《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求实》2019年第2期。

⑩ 卢云峰、陈红宇:《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基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案例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⑪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2页。

并激发其维护群体的道德义务感。而乡村公共文化的衰落,正是由于互动情境的缺乏、互动仪式的削弱和互动仪式链的受阻。当然,本文关注的是乡村公共文化的复兴,因而只是重点关注代表乡村公共文化的公共性互动仪式,而无需覆盖所有的乡村互动情境。

实际上,当前已有一些研究运用该理论探讨乡村公共文化,只不过尚未进入机制分析的层次。第一,现有研究较少以具体的复兴案例为基础进行微观机制的分析,而是以互动仪式链来提出较为宏观和抽象的复兴策略,例如,以互动仪式链提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旨向问题并给出政策建议,^①或以互动仪式链提出乡村公共文化本地化发展的建设路径。^②第二,现有研究即便涉及机制分析,也仅仅以互动仪式的短期机制来揭示单一仪式如何实现群体团结,^③而忽视了公共文化复兴的关键是基于互动仪式“链”的长期机制,即从仪式成员的团结迈向仪式链成员的团结。第三,现有研究强调互动仪式链的情感连带功能,并用于分析乡村公共文化对情感共同体的塑造,^④但这种分析忽视了互动仪式链对情感能量和理性选择的整合,也因而忽视了乡村公共文化复兴是村民将情感需求纳入理性行动的结果。

因此,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以互动仪式链为理论视角,将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研究从条件和要素分析的层次推向机制分析的层次,这不仅包括揭示微观情境中的互动仪式机制,还包括揭示动态延伸的互动仪式链机制。

三、研究方法 with 案例介绍

本文是一个理论视角指导下的质性研究,案例资料的收集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历史文献资料分析等多种田野考察的方法技术。具体而言,第一作者在2023—2024年间,对浙北地区的桥村累计开展了为期10个月的田野考察,共参与了9次村庙仪式、14次礼堂仪式,深度访谈了20位村民。桥村位于浙江省嘉兴市T县C镇,面积3.2平方公里,共867户,常住人口4600多人。桥村属于国内较为常见的非宗族性杂姓村,村庄作为行政单位的历史较短,其有记载的村史仅为77年。该村最初是民国时期C镇的第十一保,改革开放后吸纳了周边几个自然村成为现在的行政村。因此,桥村的地缘纽带较强、血缘纽带较弱,过去在公共文化上也主要以巩固地缘纽带的村庙祭祀、庙会节庆和社戏为主。但随着村庙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以及受到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冲击,村民的文化生活逐渐从公共性向私人性收缩,例如,节庆活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缺乏全村性的集体仪式活动。直到2010年之后,拆迁安置使桥村约一半的人口离开世代居住的祖宅,集中搬进了汇聚多个拆迁村落的新农村社区,这一变迁引发了桥村村民对村庄归属感减弱的担忧,村民们纷纷提议重建村庙,最终在2019年初完成了村庙重建。与此同时,浙江省自2013年起以“文化礼堂、精神家园”为主题在全省推广乡村文化礼堂建设,为村民提供综合性的文化、礼仪、学教、体育、娱乐服务,桥村也很快将礼堂建设纳入日程,并于2019年竣工。这两者代表了桥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复兴公共文化的努力,而在第一作者调研期间,这两种努力都体现出了一定的成效,本文正是试图分析这种成效背后的机制。

作为本文案例的桥村在三个方面具有典型性。首先,桥村在反映社会变迁的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村中既有拆迁安置区,也有传统聚居区,非农经济与农业经济、城镇景观和乡村景观并存,属于兼具传统与现代社会特征的转型期村庄。其次,桥村在反映文化变迁的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桥村和其他浙北地区的乡村一样经历了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的衰落,^⑤但传统文化衰而不亡,

① 任贵州:《互动仪式链理论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价值旨向的启示》,《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② 王丽培、陈雅、王丹:《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与乡村振兴建设双向赋能路径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1期。

③ 方堃、王妍妍、杨毅:《公共艺术介入民族乡村建设的逻辑路向——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透析》,《民族学论丛》2022年第4期;李钧鹏、许帅航:《作为集体欢腾的广场舞》,《江海学刊》2023年第1期。

④ 杨龙飞、疏仁华:《情感与仪式互动社会下的当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塑造》,《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马超峰、薛美琴:《文明实践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民情再造》,《求实》2022年第1期。

⑤ 曹锦清、张乐天:《传统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人情与关系网——一个浙北村落的微观考察与透视》,《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

仍持续在村民生活中发挥着凝聚人心的作用,同时市场文化、城市文化等现代文化也在不断深入村民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公共文化相互交织的局面。最后,桥村在反映乡村公共文化的复兴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近年来,桥村不仅重建了村庙,恢复了以庙俗为代表的传统礼仪文化,还积极响应浙江省的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兴建了功能齐全的文化礼堂,并迅速建立起适应现代公共文化的制度、组织,开展了相关活动。

公共文化空间和公共文化活动的增多,促进了桥村公共文化的复兴,在结果上体现为桥村的社会团结得到了恢复与强化。根据光绪年间的《石门县志》(即现在的C镇)中卷四《典礼志》的《庙祠》记载,桥村周边至少在清末时期就已围绕村庙开展了多种集体仪式活动。同时根据C镇镇志记载,直到1952年时,村庙及其相关的集体仪式仍在运行中。但在“破四旧”时期,村庙被拆,改建为丝织厂,同时村中的集体仪式和民俗活动都被作为封建迷信而禁止。此后,直至21世纪初期,村中的公共文化活动的复兴,村民的情感联结和社会关系主要由松散的地缘纽带勉强维持,即村民的归属感主要来自被动的共同居住和共同隶属,缺乏来自主动的公共文化生活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在近年来的城镇化进程中,桥村近一半的村民都在拆迁中被迁离原址,和相邻的其他行政村村民一同被集中安置在一些小区中。虽然村民在身份上仍属于桥村,且仍隶属于桥村村委会,但这一变迁造成了桥村老一代村民的地缘纽带进一步弱化,也造成了新一代村民的集体认同危机,因为村民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纽带,也不再拥有基于明确物理边界的村民身份。而桥村公共文化的复兴正是为村民提供了重建彼此情感联系的仪式情境,不仅能够恢复和强化新老两代的群体团结,更能够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新老两代共同的成员身份符号。

本文正是希望以桥村的复兴实践为案例,以互动仪式链的理论视角来揭示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机制。为了使乡村公共文化的机制分析具有更好的典型性,本文对微观互动情境的案例选取充分考虑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特征,因而主要包含以下两种公共性互动仪式:传统的村庙祭拜仪式活动、现代的文化礼堂典礼仪式活动。此外,本文还考量了乡村公共文化的乡村社会团结与国家社会团结的关系,即乡村共同体的传承与国家认同的塑造,因而还会思考乡村公共文化复兴存在的潜在问题。

四、集体欢腾:乡村互动仪式的短期局部团结

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外在表现就是仪式性公共文化活动的数量和质量都显著增加,但究竟如何增加或者说增加到什么程度才能带来复兴的结果,这其中的机制就需要以互动仪式链的视角来加以透视。互动仪式链由互动仪式所组成,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分析互动仪式如何促进了仪式成员的团结,进而从互动仪式的机制延伸到互动仪式链的机制。

(一) 互动仪式团结的集体欢腾机制

桥村的村庙仪式主要由庙管会来组织,每年共有四次大型仪式,分别是正月十六土地老爷坐衙日、清明节蚕花庙会、六月十九观音菩萨成道日、除夕上香日,此外每月还有初一、十五两次小型的仪式,具体包含念佛、拜忏、上名、烧香、拜佛等环节。桥村的礼堂仪式主要由村委会来组织,平均每月一次,大多是庆典型的集体活动或节日演出活动,还有一些红色文化仪式活动和传统文化仪式活动等。如图1所示,成功的互动仪式能够激发集体欢腾的机制,以此实现集体情感的共鸣与集体意识的强化,^①而桥村的村庙和礼堂仪式都体现了这一机制。二者在仪式要素方面是一致的,即互动情境的身体共在、明确的群体边界、共同的关注焦点和共享情感;同时,二者在仪式结果方面也具有一致性,即都以集体欢腾实现了情感能量和成员符号的再造,并带来群体团结感和维护群体的道德义务感。我们可以用村庙的“土地老爷坐衙日祭拜”仪式和文化礼堂的“最美村民颁奖典礼”仪式为例,来具体揭示两者的集体欢腾机制。

^①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第79—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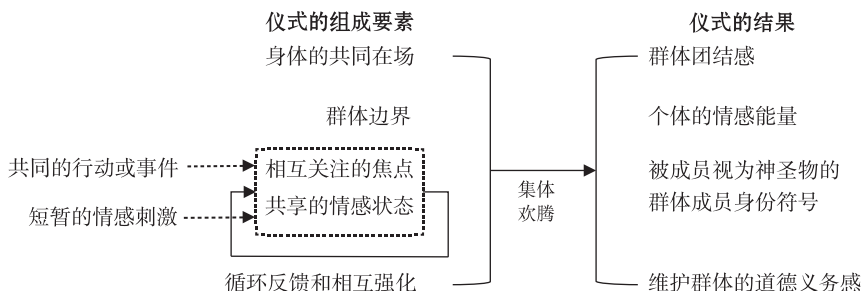


图1 桥村互动仪式团结的集体欢腾机制

具体而言，在桥村的传统习俗中，每年正月十六是“土地老爷开启新一年公堂”的日子，因而要举行仪式。庙管会中的仪式专家金仙告诉笔者：“（在传统认知中）土地老爷不仅守护活着的村民，也守护死去的村民，因而村庙就是人们联系已故亲人的一扇门，土地老爷升堂就象征着这扇门在今年的第一次开启。”（20230206-村庙）^①因此这一天的仪式对村民具有特殊意义，而村民共同聚集在村庙祭拜的同时，也借由土地老爷的“社区神”性质对自身的社区成员身份进行了再确认。仪式有着标准的行动流程，这种一致的行动构成了仪式成员相互关注的焦点。人们以家户为单位，首先在香炉处烧香祈福，并将香插入炉中，随后在蜡烛台点燃红烛并将其插入指定位置，再进入正殿祭拜土地老爷和其他神祇，进入偏殿观摩拜忏并完成上名。此时，村中的一些年老女性长辈会留在念佛堂诵经，还有人在接待室交付“上名”的费用。桥村村庙在2020年取得了浙江省统一颁发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证书，这些合法的民间信仰活动虽然并不符合科学，但却具有仪式团结的意义。例如村中的“香头”（诵经的领头人）汤奶奶提到：“以前庙的地界就是村子的地界，村子的范围就是土地老爷保佑的范围，现在庙恢复以后大家来烧香和上名，也总算是没有忘记自己是这个村的。”（20230207-村庙）在具体的仪式过程中，神像和拜忏是成员共同关注的对象，烧香、祭拜、上名则是共同经历的事件，这些仪式焦点都要求人们保持对土地老爷的严肃恭敬感，从而使人们的情感体验在仪式中实现共享和共鸣。

桥村的文化礼堂以“寓教于乐、以文育礼”为宗旨举行一系列仪式性活动，每年一届的“最美村民颁奖典礼”就是其中的典型。“最美系列评选”是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的重点配套项目，桥村所在的嘉兴市对此尤其重视，每年相关部门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并且不断改进方式方法，力求深入人心、引领乡风。在文化礼堂建成的第一年，桥村就以此作为礼堂的首次大型集体活动，在全村范围动员和筹备了两个月，并最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后该活动每年都吸引了大量村民前来参加。典礼通常由村委牵头，经全村选举而产生的最美志愿者、最美党员、最美大学生等“最美村民”将上台领奖，同时还有县镇领导致辞、文艺汇演、抽奖互动等标准化的活动流程。颁奖典礼本身不具有土地老爷那样能够代表村庄的符号意义，但在演出节目、颁奖致辞等内容上会注重对村庄符号的嵌入，例如将桥村历史融入到表演主题中、将评选标准上升为桥村的村风村训等等。所以村民在亲身参与典礼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村民身份意识的再巩固。例如，2023年桥村的最美大学生获奖者小新告诉笔者：“我们上大学以后在村里待的时间其实很少，假期回家也宅在屋里，很少跟乡亲们打交道，非常惊喜能被评选为最美大学生，和乡亲们一起参加颁奖和观看演出，我第一次这么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是村子的一员。”（20230815-礼堂）颁奖典礼的仪式过程也有共同的焦点，颁奖、致辞、演出是仪式成员共同关注的对象，鼓掌叫好、现场互动则是村民共同经历的事件，人们在此过程中沉浸在欢乐喜悦的情感体验中，并通过彼此的情感共享而强化了这一体验。

上述两个互动仪式的参与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和事件上，并通过相互意识到对方的焦点，形成了彼此意识高度一致的专注性，进而体验到彼此情感的连带性，使个体情感成为一种更强烈的集体情感，最终使个体意识被集体意识所主导，也就是达至一种集体欢腾的仪式结果。在

^① 此处主要记录访谈时间和地点；访谈对象按照学术惯例采用化名。

此，集体欢腾将短期的共同情绪转化为了长期的情感能量。无论是村庙祭拜的肃穆，还是礼堂典礼的喜悦，都在集体欢腾中转化为比具体情绪更持久的情感能量。这种情感能量的增加能够鼓舞个体的日常行动，使个体感到来自群体的支持感、认同感、归属感，同时也使个体对自身的群体成员符号感到神圣感。成员符号是情感能量的伴生物，是集体欢腾对仪式团结的符号化，它将不同的互动仪式情境转化为了一致的符号崇拜。无论是村庙祭拜还是礼堂典礼，在集体欢腾的过程中，参与都感受到了群体象征物的神圣性，并感到自己有保卫这些神圣符号的道德义务。例如，祭拜仪式参与者不容有人亵渎神像和违反祭拜规范，他们认为这些行为将给群体带来灾厄；“最美村民颁奖典礼”仪式参与者不容有人扰乱庆典秩序和违反活动规则，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对群体的蔑视。

（二）互动仪式团结的局限性

在桥村的实践中，老一代村民为了维系因村庄格局变迁而面临消散的地缘关系网络，新一代村民为了重建对于村庄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感，他们都有强烈的意愿建设地标性公共文化空间（如村庙、文化礼堂），并通过这些空间中的互动仪式巩固地缘团结、获取情感能量。如上文所述，村庙和礼堂的互动仪式确实通过集体欢腾机制来凝聚村民，使仪式参与者的个体意识融入到以“村民”符号为核心的集体意识中，并以此建构村庄的社会团结。然而，这种成功的互动仪式只是桥村公共文化复兴的起点，无论某次互动仪式实现了多么成功的集体欢腾，也无法单独支撑桥村的社会团结。

首先，互动仪式经由集体欢腾实现仪式参与者的群体团结，群体成员也被赋予了“村民”的身份符号，但是单一的互动仪式所能覆盖的群体范围是有限的。其次，单一的互动仪式不仅无法覆盖所有的村民，而且还可能产生意外后果，例如下文将介绍失败的互动仪式如何削弱群体团结和降低情感能量，并且成功的互动仪式也可能意外创造出新的成员符号，使仪式参与者形成与社会团结相反的“小圈子文化”。最后，集体欢腾带来的情感能量和成员符号也并非永存，而是会随着时间不断消退，需要不断补充和再造，因而村民不可能通过一两次互动仪式而实现持久性的群体团结。

可见，乡村公共文化的复兴机制不能只从互动仪式的集体欢腾中得到解释，因为集体欢腾只是短期性、局部性的仪式成员团结，而非长期性、整体性的乡村社会团结。我们需要从仪式成员团结走向仪式链成员团结，进入到互动仪式链意义上的长期机制分析。

五、仪式团结市场：乡村互动仪式链的长期整体团结

在互动仪式链的视角下，多种互动仪式构成了一个互动市场，人们在互动市场中拥有情感能量与成员符号这两种关键资本，并以成本—收益最大化逻辑在互动市场中选择不同的互动仪式。^①在这种互动仪式链中，仪式团结是收益的来源，不同程度的仪式团结组合成了一个仪式团结市场（由多种互动仪式构成的、以情感能量和成员符号为资本的理性选择场域），而人们在该市场中的理性选择就构成了仪式链成员团结的机制。^②图2呈现了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互动仪式链，其中又可分为互动市场、情感能量、符号匹配这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

（一）互动市场：理性选择下的优胜劣汰

柯林斯认为，互动市场的视角使我们进入到个体的长期生活轨迹中，考察其如何在不同的互动情境中做出选择，以及如何在互动仪式链中实现情感和符号的传递。^③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如村庙、文化礼堂等）中的某一次互动仪式仅仅是乡村公共文化的一部分，发生在这些空间中的所有互动仪式所组成的互动市场，才能反映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长期机制。互动市场中不仅有成功的仪式，还有失败的仪式，后者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空洞的仪式，即徒有形式的仪式；另一种是强迫的仪式，即参与者非自发参加的仪式。^④

①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第204—208页。

②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第212—213页。

③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第172、204页。

④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第84—8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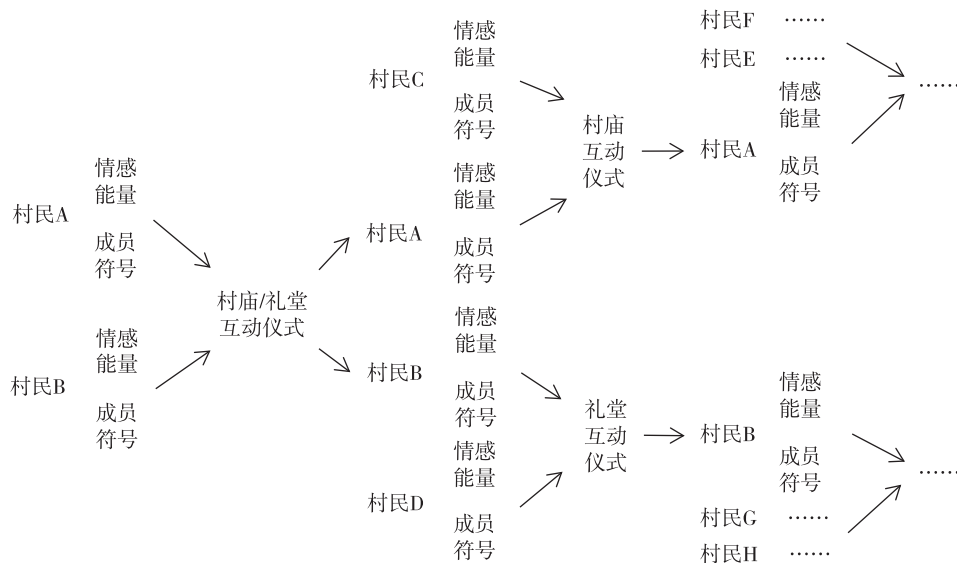


图2 桥村乡村公共文化的互动仪式链

在桥村的乡村公共文化互动市场中，两种失败的仪式都并不鲜见。其一，桥村早期的一些礼堂节庆活动就是空洞的仪式，仅仅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文化工作指标而举行。例如，在桥村早期的三八妇女节讲座活动中，参与者主要是被活动礼品所吸引，并不寻求情感能量的补充，而仪式本身往往是走个过场，只为了留下一些照片和文字记录。桥村的妇女小组长心慧回忆说：“以前没有经验，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就找人开知识讲座，但是来参加的人基本都在下面刷手机，有些人领了奖品中途就走了，互动环节也没有人愿意提问。”（20240308-村委会）参与者在参加仪式的时候停留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缺乏相互关注的焦点和情感共鸣。其二，桥村的村庙仪式在刚恢复时以念佛和烧香为主，这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就是强迫的仪式。村中的大学生若尘回忆说：“村庙刚恢复时，奶奶非要拉我去烧香，我其实不愿意去，我们这代人对村庙没什么记忆，去了也就走个流程。”（20240115-若尘家）他们缺乏对仪式的认同感，但却被要求假装出一种参与性的全神贯注，因而感到拘谨和厌烦，造成情感能量的耗损而非补充。可见，成功的仪式能通过集体欢腾产生情感共鸣，使参与者获得情感能量的升腾；反之，失败的仪式则缺乏参与者的情感连带，没有形成群体团结感和群体符号的神圣化，致使个体不是获取而是消耗情感能量。

实际上，乡村公共文化的复兴必然同时包含许多成功的仪式和失败的仪式，而复兴的机制之一就是各种仪式在互动市场中的“优胜劣汰”。个体在互动市场中参与互动仪式的行为是一种理性的市场选择行为，^①在桥村的公共文化复兴过程中，村民对这些互动情境的选择和组合不是随意的，而是一种具备统一标准的理性行动模式。村民在互动市场中选择参与何种互动仪式情境，正是村民理性衡量总体情感能量流（将不同的互动仪式组合成情感能量总回报最高的互动仪式链）的结果。因而，仪式参与者倾向于选择成功的仪式、远离失败的仪式。例如，村委会在礼堂举办的各类讲座就不受村民欢迎，庙管会在村庙举办的念佛烧香就不受年轻村民欢迎，因为这些仪式情境缺乏真正的互动性和公共性，不能以仪式团结带来情感能量收益。同时，仪式组织者也会因成本问题而放弃或改进失败的仪式，例如，空洞的仪式往往需要额外的物质成本来吸引参与者，强迫的仪式往往需要额外的组织成本来约束参与者，这都使得这些仪式因缺乏竞争力而逐渐退出互动市场。

可见，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提升乡村社会团结的机制之一，就是通过对互动市场的激活，使成功的仪式被延续、失败的仪式被淘汰或改进，最终提升村民在整个互动市场中的情感能量获得感。如

① 王鹏、林聚任：《情感能量的理性化分析——试论柯林斯的“互动仪式市场模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表 1 所示, 桥村的仪式组织者们淘汰了“书法培训”“健康知识讲座”“红色老电影放映”等失败的仪式, 保留和发扬了受到村民欢迎的“最美村民颁奖典礼”“我们的村晚”“土地老爷坐衙日”“观音成道日”等成功的互动仪式。此外, 桥村还将原本较为空洞的“三八妇女节讲座活动”改进为更有互动活力的“三八妇女节亲子手工坊”, 另外, 通过在村庙仪式中加入村史教育、节目表演、流行歌曲等元素吸引年轻人, 减少年轻人参与仪式的被强迫感。

表 1 桥村互动市场中的部分仪式

仪式类型	仪式名称
成功的仪式	最美村民颁奖典礼、我们的村晚、文化进万家系列演出、我们的节日系列演出、手工制作节日贺卡、广场舞培训、花鼓戏、越剧表演、土地老爷坐衙日、观音成道日、除夕上香日、清明节蚕花庙会等
失败的仪式	书法培训、素描培训、英语培训、健康知识讲座、安全知识讲座、营养知识讲座、国画比赛、暑期读书活动、红色老电影放映等

总之, 在个体理性选择的驱使下, 互动市场得以不断延续成功的仪式和淘汰失败的仪式, 从而不仅使老一代村民在仪式的传承(如村庙仪式)中恢复地缘团结, 使新一代村民在仪式的变迁(如村庙仪式的年轻化)中建立集体认同, 而且还令新老两代村民通过仪式中的合作(如礼堂的亲子活动)建立彼此之间的团结与认同。

(二) 情感能量: 集体理性下的合作共赢与多元活力

情感能量是个体在互动仪式链中采取行动的重要标准和根本动力, 个体选择加入哪些互动仪式, 取决于他们从该仪式中预期得到的情感能量收益, 即个体总是试图在互动市场中实现最大化的情感能量积累和循环。^①如图 2 所示, 乡村公共文化的互动仪式链包含了两种情感能量的积累和循环方式: 一是同一互动仪式的周期性重复。例如, 村庙仪式和礼堂仪式都有一个重要仪式的年度周期表。二是不同互动仪式之间的有机式组合, 例如, 不同的村庙仪式、不同的礼堂仪式, 以及村庙仪式与礼堂仪式之间常常相互交叉。这些仪式链条又包含了个体与集体的两条线索: 村民 A 所选择的互动仪式构成了互动仪式链的个体子链条, 反映的是个体情感能量; 村民 A 至村民 H 所选择的互动仪式则构成了互动仪式链的集体子链条, 反映的是集体情感能量。

在情感能量的意义上, 乡村公共文化复兴其实就是乡村互动仪式链所激发的集体情感能量的增长。因而本文在这一点上与柯林斯有所不同, 柯林斯认为微观情境是更根本的, 所以互动仪式链更加关注的是个体理性所对应的个体子链条, 但乡村公共文化复兴所要解释的不是个体链条而是集体链条的增长, 这使得本文不能简单套用互动仪式链视角, 而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转换。对村民个体而言, 乡村公共文化复兴并非他的目标, 他所追求的只是情感能量的最大化, 这是他在仪式链条中选择相应互动情境的唯一内驱力。而本文所要揭示的是, 成功的互动仪式链恰恰能在这种个体理性动机的基础上, 实现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集体理性结果。

这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一致的原因在于, 仪式团结市场中的团结感(及其相关的情感能量)是一种特殊的集体利益, 它只能在互动合作中产生, 因而不会出现个体目标与集体目标相矛盾的“搭便车”问题。个体之间只有在共同致力于维持相互关注, 并使自己融入共同情感的累积中时, 才会得到团结感的短期回报, 而长期的回报更是依赖于双方以相同的持续时间维持该关注焦点。^②以桥村的“蚕花庙会”为例, 这是浙北蚕桑地区许多村落共有的蚕神祭拜传统。在这一天, 伴随着锣鼓队和杂技队的表演, 蚕神和其他神灵被从村庙中抬出巡游, 村民夹道迎神并祭拜。在庙会刚恢复的时候, 老一代村民基于共同记忆而互动合作, 形成共同情感的累积, 并在情感共鸣的团结感中获取情感能量。而新一代村民由于缺乏共同记忆而难以形成互动合作, 只能从仪式的低度参与

①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 第 224 页。

②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 第 211 页。

中获得层次很低的团结感。村中的洪坤及其孙子洪石就形成了典型对比,洪坤认为:“我和金发、春实他们以前都抬过蚕花娘娘的轿子,现在村子变了这么多,但只要看到庙会的热闹,就好像回到了从前。”(20240408-洪坤家)洪石的感受就比较复杂,他提到:“第一年办庙会的时候,我和朋友们都去看热闹了,但除了感到新鲜外也没什么特别的,爷爷他们总说起以前的村庙和戏台,但我一直觉得那和自己没什么关系。”(20240408-洪坤家)然而,在长期视角下,村民为了在这类周期性重复的仪式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情感能量,需要反复地生产新的共同记忆,以便在下一次仪式中与其他村民持续建立对焦点的关注,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庙会仪式的新老接替中。新一代起初对庙会仪式的参与度并不高,因而只能获取很低的情感能量,但随着庙会仪式的周期性举行,新一代也积累了共同情感,并在此过程中逐步继承了集体记忆,这就使得新一代不仅在积极参与中提升了自身的情感能量回报,而且在与老一代的合作中提升了村庄整体的情感能量回报。洪石说道:“第三年办庙会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村外的人来看热闹,我和朋友们都感到很骄傲,而且从第四年起,我们也开始给庙会帮忙了,也算是继承了爷爷,把这个文化传下去。”(20240408-洪坤家)可见,源自仪式团结的情感能量具有天然的合作性,个体虽然在单次以自身情感能量的最大化为出发点,但在长期性的互动仪式链中,个体就会寻求与他人的合作共赢,从而达成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

这种统一不仅反映在村民对周期性仪式链的重复参与中,也反映在村民对不同仪式的选择性组合中。由于情感能量在同一互动仪式中对不同个体来说是分层的,互动仪式的主导者将获得更多的情感能量,而互动仪式的跟随者将获得较少的情感能量。^①因此对不同的村民来说,在活跃的互动市场中,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更能居于主导地位的互动仪式。例如,新老两代村民就有着明显不同的偏好,村民A可能是熟悉拜忏仪式或擅长念诵佛经的老一代村民,因而选择参与村庙仪式;村民B则可能是擅长歌舞表演或流行才艺的新一代村民,因而选择参与礼堂仪式。在互动情境更加多元的条件下,村庙仪式、礼堂仪式以及其他公共仪式都可以划分出更多的仪式类别,从而使更多的村民能够组合出自身情感能量收益最高的仪式链条。类似宗教市场理论中的“多元市场促进宗教活力”命题,^②互动仪式链的仪式团结市场也有着“多元促进活力”的类似机制。在桥村公共文化复兴的例子中,桥村的互动市场越活跃,可选择的互动仪式也就越多元,对不同村民而言能获得更高情感能量收益的互动情境也就越多。例如,桥村的一些村民擅长舞龙,但过去缺乏在公共仪式活动中进行表演的机会,而随着礼堂仪式的多元化,舞龙表演也得到了更多的展示机会,这些村民也因而能够在相应的互动情境中获得更多的情感能量。随着每个村民都越能够组合出符合自己的最优仪式链条,村庄整体仪式链条的情感能量水平也越能够实现最大化,最终使得互动仪式的局部性团结迈向了互动仪式链的整体性团结。

(三) 成员符号: 符号匹配下的群体互通与身份共享

不同的互动仪式承载着不同的成员符号及其对应的身份意义,因而互动仪式链也可视为一个成员符号的连续统,其中个体所拥有的成员符号数量和性质将影响他参与后续的互动仪式。当个体之间的成员符号越匹配时,他们就越容易在互动仪式中获取更多的情感能量,因为这种符号提供了谈论和行动的共同焦点,从而更能够达成集体欢腾。^③不过,柯林斯认为情感能量才是激发个体参与互动仪式的根本动力,而成员符号只是通过匹配程度来影响情感能量的获取,从而间接影响个体对互动仪式的选择。^④本文则有所不同,因为从乡村公共文化的视角来看,成员符号的重新塑造才是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标志,即通过互动仪式链打破不同仪式的群体边界,实现小群体之间的互通与乡村公共身份的共享,将村庄仪式团结市场的共有群体边界扩张到最大公约数(村民)的层次。

以图2为例,村民A和村民B在任一时刻都会携带一定存量的情感能量和成员符号,两者在一次村庙或礼堂的互动仪式中相遇时,无论这次互动仪式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转变一部分情感能

①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第222页。

② Jason Wollschlaeger,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and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Sociological Forum*, Vol.27, No.4, 2012, pp.896-912.

③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第214页。

④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第223页。

量和符号储备,然后作为下一次与村民C或村民D一同参与新互动仪式(可以是先前互动仪式的重复,也可以是新的互动仪式)的运行条件。假如前一次互动仪式的符号资本与后一次互动仪式的成员符号不匹配,那么个体难以将先前的身份意义运用于新的情感共鸣,从而因较低的情感能量预期而倾向于远离这一互动情境。^①在乡村互动情境较为匮乏和松散的情况下,村民所储备的符号资本较为有限,且在互动仪式链中可匹配的成员符号也较少,因而为了减少情感能量投资的风险,村民更倾向于选择自身所处团体内部的互动仪式,导致难以生成公共性较强的成员符号。例如,在桥村公共文化复兴的前期,村中的村庙仪式和礼堂仪式并未联结成互动仪式链网络,双方参与者的群体边界是相对隔离的。村庙与“老一代村民”所积累的成员符号最为匹配,因而他们对村庙仪式具有高度的参与热情,而对文化礼堂这一集体记忆之外的政策建构产物缺乏认同,同样,文化礼堂则以现代化的文体娱乐设施及相关仪式活动吸引并塑造着“新一代村民”的成员符号。这种群体身份的隔离使得桥村的公共文化看似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但却并未达到恢复和强化村庄整体公共性的效果。

因此,新老村民必须打破各自的群体边界,通过不同互动仪式的共同参与来实现群体互通,以小群体仪式链条的相互交叉形成更大范围群体的仪式链。这就要求一些公共性互动仪式能够产生更具包容性的符号资本,使参与者能够凭此匹配更多的互动仪式。例如,村庙的“上香”仪式通过共同向土地神祈求新一年的福祉强化村民的命运与共感,礼堂的“村晚”仪式通过文艺汇演在“欢天喜地过大年”中强化村民的情感联系,两者都对应春节的辞旧迎新之意,在时间上和主题上都非常接近,因而参与者在仪式过程中所唤起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共鸣也较为一致,其所生产的成员符号也具有较高的匹配性。作为结果,两个仪式的参与者尽管在早期并不重合,但在多年的发展中却显现出越来越高的重合性。根据桥村副书记嘉文所说:“2020年的时候来村庙的大多数是五六十岁以上的村民,来礼堂的大都是小孩和三四十岁的村民。”(20240208-村委会)而在笔者2024年的考察中,村庙和礼堂仪式的参与者重合度已有50%以上。再如,庙会仪式中的舞狮舞龙、花船游行等活动逐渐被礼堂仪式所吸收,桥村的舞龙队成员国强就说道:“舞龙以前和蚕花娘娘巡游是一起的,象征驱邪,也被当作封建迷信禁止了很久,恢复了以后,村委会一开始办活动还是不叫我们的,但后来发现大家都爱看,就叫上我们了。”(20240328-国强家)在此,文化符号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界限不断被打破,从而使相关仪式所生产的成员符号也越来越具有匹配性。这些仪式起到了连通村庙仪式与礼堂仪式的作用,而且这种符号匹配还能在仪式链的传递中叠加为更具包容性的符号资本,也就是“村民”这一村庄中各类身份符号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了符号匹配将“村民”提取为连通不同群体的共享身份符号的作用。这种更具包容性的成员符号往往在群体性仪式链中被重复使用,因为村民个体会为了获取更多情感能量而借这一成员符号去匹配尽可能多的互动仪式,从而最终为仪式链条中的成员赋予最大程度的身份共享。在此意义上,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机制之一,就是不同群体在互动仪式链中共同参与多种互动仪式中,并在这种群体边界的互通中传递和共享彼此的成员符号,最终使仪式链成员的群体边界不断扩张至最大公约数(村民)的层次。

综上所述,村民参与单一的互动仪式只能形成小范围的、暂时性的群体团结,而在互动仪式链的仪式团结市场中,借助互动市场、情感能量、成员符号的三重作用,理性的仪式组织者和参与者一方面通过互动仪式链的多元性强化村庄整体的公共活力,另一方面,通过互动仪式链的互通性恢复村庄整体的公共意识,最终建立起村庄整体的长期社会团结。简言之,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来看,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本质,就在于乡村的各种互动仪式能够通过链式循环反馈的方式,将村民尽可能地纳入互动市场的仪式网络中,将单次集体欢腾的局部性群体团结转化为仪式团结市场的整体性群体团结。

六、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在互动仪式链的视角下,以浙北桥村为经验案例,透视乡村公共文化复兴

^①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第215—216页。

的机制。如图3所示，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外在表现，就是通过乡村公共性互动仪式的量质提升来恢复与强化乡村的社会团结，而它的内在机制则需要借助互动仪式链视角来加以剖析。具体而言，首先，成功的互动仪式（如本文所举例的村庙仪式和礼堂仪式）是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基础，参与仪式的村民在集体欢腾的机制下，将相互关注的情感共鸣转化为群体团结的情感能量与成员符号。然而，这种单一仪式的村庄团结是短期的和局部的，不足以支撑乡村公共文化的复兴，因此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互动仪式链的仪式团结市场来实现长期的、整体的村庄团结，这一机制又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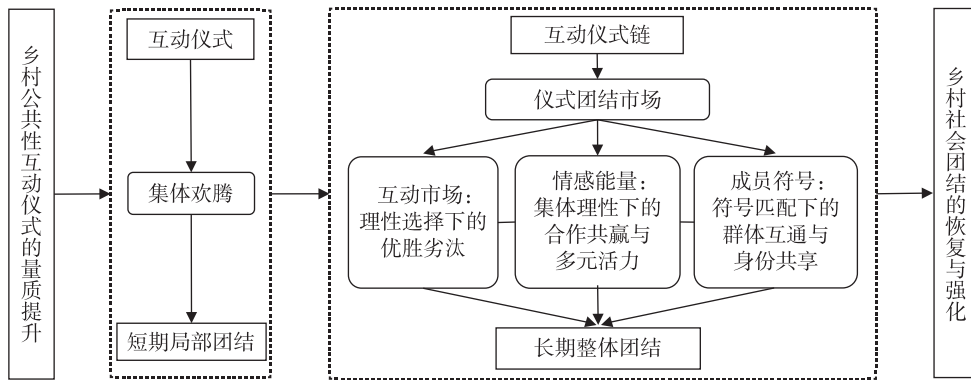


图3 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机制

其一，不同的乡村互动仪式组成了一个乡村互动市场，村民在此遵循情感能量最大化的理性行动原则，倾向于选择成功的仪式补充情感能量、避免失败的仪式耗损情感能量，这使得互动市场不断优胜劣汰。在桥村的实践中，老一代村民对村庙仪式的传承，以及新一代村民对村庙仪式的改进，就显示了在互动市场的调节作用下，新老两代村民得以共同在成功的仪式中获取群体团结带来的情感能量。因此，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必须注重互动仪式的灵活调整，才能使互动市场足够活跃，进而以更多成功仪式为基础组成有效的互动仪式链。

其二，村民个体在互动仪式链中追求的是情感能量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但由于仪式团结的收益具有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一致性，因而，不仅形成了参与者的合作共赢关系，还形成了仪式团结市场的多元程度与情感能量的正相关关系。在桥村的实践中，新老两代村民基于个体理性动机，既可能在周期性仪式的世代接替中合作，也可能在各自的偏好下选取不同的仪式组合，但最终都能使新老两代村民实现情感能量的正向循环。因此，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必须提供足够多元的互动仪式选择，才能让每个村民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组合出个体情感能量最大化的仪式链，进而使村庄整体的仪式链实现群体情感能量流的最大化。

其三，村民在互动仪式链中储备了一定的成员符号资本，这种成员符号的匹配程度影响着村民在新仪式中的情感能量收益，这使得村民倾向于将自身的成员符号拓展至更大的范围，从而尽可能地匹配到更多的成功仪式。在桥村的实践中，村庙仪式的恢复契合了老一代村民的成员符号资本，礼堂仪式的设立塑造了新一代村民的成员符号资本，而两者的交叉运行与互促共生又使得新老两代村民打破了彼此的群体边界。因此，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必须包括成员覆盖范围更广的互动仪式，以及在不同类型的互动仪式之间建立互通互促关系，从而在符号匹配的作用下使仪式链成员的共享身份符号扩张至最大公约数（村民）的层次。

由上述分析可见，本文也并非对互动仪式链的简单套用：其一，互动仪式链强调微观情境和个体理性，其机制分析以个体对情感能量的投资收益最大化为核心。^①但本文重在解释乡村公共文化的

① Randall Collins, Robert Hanneman, "Modelling the Interaction Ritual Theory of Solidarity", in Patrick Doreian, Thomas J. Fararo (eds.), *The Problem of Solida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213-237.

复兴机制，因而将互动仪式链的视角从个体理性转向集体理性，分析集体层面的目标最大化如何与个体层面的理性选择相契合。其二，互动仪式链在情感能量和成员符号这两个关键资本中更强调前者的重要性，因为情感能量是个体参与互动仪式的基本动力，而成员符号只是间接影响情感能量的收益。^①但本文需要研究乡村公共文化促进乡村公共性的机制，因而选择将成员符号摆在和情感能量同等重要的位置，分析集体成员如何在追求情感能量的过程中实现了成员符号的传递与共享。

概而言之，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核心机制，在于互动仪式链的仪式多元所带来的情感能量累积，和仪式互通所带来的成员符号匹配，以及建立在这两者基础上的道德团结。这一机制不仅能够解释像桥村这样复兴较为成功的村落，也能够用于解释复兴较为失败的其他村落，还能够用于指导其他正在建设公共文化的村落，这也是机制分析的最大意义所在。

限于主题和篇幅，本文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之处：其一，互动仪式链机制包含了私人性互动仪式和公共性互动仪式，本文仅关注了公共性仪式对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作用机制，但私人性互动与公共性互动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联系的。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两者的相互作用，从而更完整地探讨公共文化复兴背后的互动仪式链机制。其二，互动仪式链机制不仅有着促进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的正面影响，也有着道德强制和过度排外的负面影响，而本文并未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乡村公共文化的复兴存在两点可能的缺陷：一是道德团结的神圣性容易对部分村民形成束缚和强制，二是道德团结的排他性容易对外部社会产生排斥。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化解这种负面影响的方式，例如将乡村公共文化的公共性拓展至更大的范围，将互动仪式的链条拓展到村庄之外，更加注重乡村公共文化与区域性公共文化、国家公共文化的联结。

（责任编辑：薛立勇）

On the Mechanism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WU Yue LU Yunfeng

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on structural elements, whi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this study takes the public interaction rituals (temple rituals and auditorium rituals) in Qiao village, northern Zhejiang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revealing two interrelated mechanisms driving rural public culture revitalization: First, th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generated through interaction rituals creates emotional energy and membership symbols that foster group solidarity through mutual attentional engagement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However, such solidarity tends to be short-term and localized. Second, the ritual solidarity market is built upon these interaction rituals, enabling different rituals to generate long-term, holistic solidarity through chain-like circulation and feedback. This mechanism operates through three interdependent processes: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interaction market, the collective rationality of emotional energy, and the symbolic alignment of membership symbols.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key to rural public culture revitalization l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village's comprehensive public vitality through the diversity of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while simultaneously restoring collective public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ir interconnectivity. Ultimately, this dual approach establishes enduring social solidarity at the village level.

Keywords: Rural Public Culture;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The Market for Ritual Solidarity

^① Randall Collins,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and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in Christian von Scheve, Mikko Salmela (eds.), *Collective Emo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99-311.